



创新是我们永远的使命

——2011年散文创作述评

□韩小蕙

创造,是人类永远的使命。创新,是我们作家永远的使命。

2011年度的散文创作呈现出新的面貌。所谓新的面貌,不仅指作者的名字新,也说的是这些作品多为近年来非常流行的“新新散文”,即具有作者年轻化、行文诗化、构思奇诡化、结构随意化、语言缩密化、意向空灵化、面貌陌生化等的特点。如果说在21世纪初那个时段,“新新散文”还是点点星火,那么在今天的散文文坛,它已经燃成燎原之势了。

2011年的“新新散文”中,较突出的有沈苇的《女士们的西湖》。初看这个题目,怎么也想象不到这是一篇游记散文。这些“女士们”,竟然是白娘子、苏小小、祝英台,还有《断肠集》的作者、女诗人朱淑真,花魁女辛瑞琴,削发为尼的琴操,孤山别墅里的恋影者冯小青,李渔家班里的女乐,戴望舒笔下的丁香姑娘,革命者秋瑾……通过述说她们与西湖的关系,写出了杭州西湖的地域和文化、传说和故事、前世与今生,这是多么诡异的角度,多么聪明的构思啊;还不止于此,作者还在记述、描写了西湖的自然美景之后,又率真地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愿望:为了环保和大自然,希望西湖是一个静止在青春期、再也不要成长的湖;写到这里,作者再度把笔锋一转,继续把文章深化下去,从杭州城里到处都是的瓦舍、酒楼、歌馆、茶坊,以及无处不在的饮宴、歌舞、美食、艳妓……所堆砌出来的无边风月,联想到西湖是女性享乐主义的湖,是对男人们的消磨和解构,因为“西湖这个感官与欲望的渊薮,会把他们的骨头变成脆骨、软骨和无骨”。虽然结论有着“愤青”的偏激,但的确发人深省。

青年女作家纳兰的《欢会》也可看作一篇“新新散文”,但它不是胜在语言的狂欢,而是靠着冷辣的叙述视角、颠覆性的讽刺挖苦和我自岿然不动的自我解嘲,把当下流行的各种各路电影发布会,把那些发布会上上、内外的形形色色的奇人与奇事,淋漓尽致地抖落出来,大快朵颐地数落了一番,算是报了她当“小影记”时受害之仇。这种“80后”的眼光,离经叛道,尖刻料峭,刚好弥补了场面上的正统与道统,让我们从其颠倒的思维中,获得了耳目一新的体验感和解脱感,重新打理起属于自己的思维,咀嚼世界、社会、人生、路途等的多种新与旧的滋味。

可惜像沈苇和纳兰这种新颖的“新新散文”还是比较少的。在连续阅读了七八篇“新新散文”之后,我就产生了审美疲劳。因为我发现,它们已停滞在创新的门槛之前,出现了千篇一律的同质化倾向。在这里,模仿是第一杀手,大家都企望一窝蜂地搭上这艘船,跻身这场最时尚的语言狂欢。然而,也许是今天的文学人口基数太大了,一两个人的模仿还不算什么,但一两百人、一

两千人都如是模仿,就变得非常可怖了。所以,我认为追随“新新散文”的群体性摹写,已遇到一块写着“火山禁地,禁止通行”的牌子,另辟新路是前行的惟一通道。而冲出去的希望不是不存在,谁若是能找到克服“新新散文”固有弊病的通道,比如拓宽它社会容量的视角,增加它思想的含金量,激发它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等等,谁就能在当代散文史上留下新的身影。

二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也许文学与历史并无可比性,不过,研究一下传统的现实主义为什么能数百年来一直长盛不衰,从中汲取它能永保青春的奥秘,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工作。

在2011年的“传统散文”中,刘上洋的《江西老表》是一篇突出的佳作。改革开放33年,沿海的“珠三角”声名大噪,“长三角”后来跟上,之后是京津冀振翅,最后就连大西北也都跟着动了起来,可是中部的几个省却老是停留于“醉里挑灯看剑”的梦影境界里,这究竟是为什么?读了刘上洋这篇剖析江西人性的散文,让我觉得很难得,似乎找到了一些端倪。刘上洋本是江西人,又多年在江西从政,想必对江西全省的发展问题已思考了多年,现在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便冲决而出,洋洋洒洒13000字才罢手。该文共分9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全面分析了江西人性的丰富内涵和形成原因,概括出其温和与守矩而缺乏敢为天下先、不排外但会搞内耗、缺乏创造力和市场经济观念等6个特点,并犀利地指出江西要想崛起,必须彻底冲破传统观念对人的桎梏,改变老表性格中的弱点和缺点。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该文所具有的深刻和率真,这么全面、深入、有见地地解析一个省的人性、举止,此前我还没有读到过;而“率真”,是说文章里具有一种“知识分子”(或曰“文人”)保留在血液里面的“天真”和“率性”,自古以来,以天下为己任的许多文官,不论做到多么高的官位,都还能保留着这种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敢于说出真话来的天性,比起那些官场的老奸巨滑混蛋者,这种率真是多么的稀少、又是多么的宝贵啊!由是,亦又一次证实了散文写作的一个基本道理:文章者,情动于衷而形成于言,充沛的激情、独到的见解、为国为民大声疾呼的“先天下”境界,永远都比浮词要精彩得多。

在这个意义上,我再次重申我一贯坚持的观点:应该理直气壮地看重和力挺那些勇于涉及国家、民族、社会、民生、发展、前进的大题材之作。比如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历史是伟人的传记》和《我离民国有多远》二文,作者徐刚以半文半白的笔墨,对献身国民革命的康有为、梁启超致以深深的祭拜,同时激情地呼喊:“当今之世也,物质挤压、精神贫乏、科技日新月异发展,文化夜以继日沉沦,有此承接,或可使人日渐平庸、行将枯槁,有白话而无文的文化人若我辈,亦或

因此得一风生水起,荒草重绿之机。”这是多么痛心疾首的现实认识,是多么迫切的民族文化焦虑,又是多么不行而强行的挣扎啊。谁说散文只是茶余饭后的一道甜点,只是点缀生活的小花小草,只是结构、语言、知识、灵性、聪明度的考察,只是一己的悲欢、一家的聚散,散文亦经国之大业哉!

又如记录了1937年9月山西原平阻击日寇大战的《将军无头》一文,作者崔济哲成长于山西,多年工作于晋地,对那场大战和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民族英雄们,一直存有深深的崇敬和怀念;出身贫寒的晋绥军196旅旅长姜玉贞将军,身先士卒率领着全旅官兵硬是在日本鬼子的步枪、机关枪、大炮、飞机轰炸甚至毒气都用上了的残酷决战中,奉命死守原平10日,最后身负重伤,被鬼子乱刀刺死,割去了头颅。这一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在中华大地流传。半年后,毛泽东在演讲中说:“从姜玉贞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两年后,日军在原平建立了一座“中国无名战士慰灵塔”,是被中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彻底折服了,所以作者紧跟着评说道:“魔鬼的赞誉也是赞誉。将军无头,将军不朽!”这样的文章读罢,心潮久久难平,尤其是在当下灯红酒绿,一派“金不换,香留醉”的社会氛围中,中国人需要多读读这样有血性的大散文。

还有数篇有着扎实内容的散文,记述了当代的一些人物和一些重要事件,也是我很看重的。周明的《夜闯中南海》记述了1983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颁奖大会前夕的一次“突发事件”,由于有人诬告,翌日的颁奖面临告吹,当事人连夜“闯”入中南海而使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赢得了与会作家们的欢呼,也赢得了文坛的心。这个颇令人感慨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忠实记录事件过程的文学档案,在其背后,更披露出当年处于思想解放之中的中国社会的氛围、世道人心和全党、全民同心协力朝前走的政治激情。聂还贵的《最后的河流》以凄美的调子为全世界日益消瘦的河流唱出了一首哀伤的挽歌:“我知道,我知道河流,那灌溉我们生命的河流,跟随着我们身边日夜歌唱的河流,一条一条,银鱼一样正离我们远去。”听着这样的歌声,眼前立刻出现了无数个河流断裂、土地干涸、动物植物死亡的画面,一想到这样骇然的场景正朝我们身边步步逼近,一颗心就坠上了沉重的铅砣。旅美作家张宗子的《风容》颇有点像是一个立此存照的大榜,一件一件排列了不少古文人、老人和当红文人做下的事情,有些已是当事人不想再被人提及的隐私事,但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文章都是白纸黑字留下的,想赖也赖不掉,所以无论世界怎么剧变,无论世风怎么吹拂,汉奸都是汉奸,魔鬼都是魔鬼,宵小都是宵小。可叹的是我们社会的很多人在资本和权力的选择面前,都只拜认了金钱和势力,却轻松地抛弃了最最重要的“做人”,甚至不惜为汉奸

洗脱、为宵小诡辩、为魔鬼张目……底线崩塌了,原则倒地了,美丑是非大翻车,而让我久久感慨的是,这些平常的道理,倒是海外的作家提醒我们不能忘记!

三

从散文的艺术水准来说,2011年虽不能说是一个大年,但也还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年份,有几篇文章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藏族作家丹增的8000字长文《香格里拉》犹如一幅金碧辉煌的巨幅唐卡,徐徐展开来,顿时金光四射,鸟语花香,祥瑞缭绕,极乐幸福,人神共享。他说的是古往今来,中西方、藏蒙满、俗僧士、农牧商、男女老中青各色人等,怀揣着追求人生终极幸福的信念,不绝如缕地前往路途遥远艰险的藏地,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寻找“香巴拉”(一译“香格里拉”),指心中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历程。作者的笔墨不疾不徐,于冷静的逻辑叙述中跳荡着火热的激情,在平实的文字表达中闪现出绚烂的辉光,又隽永地道出了他自己集一生的曲折身世、不绝寻求和锥心泣血思考而形成的世界观。请看下面这段既华美,又深刻智慧的文字:“香巴拉既不是神秘消失的玛雅遗址,也不是捕风捉影的外星人,更不是虚无缥缈的尼斯湖水怪,它是圣明的佛祖和代代相传的贤人子弟缔造的独特的精神家园。它不是凡人在今生中不能轻易抵达的彼岸世界,而是佛教信众可以在心田里萌生的极乐净土,在梦想中成真的彼岸天堂。”

朱以撒的《腕下消息》精美、大气、深刻、隽永。这是一篇以散文的美丽来言说书法的艰深的两栖文章,可让我们从文学中窥见书法的堂奥,又从书法的审美中感受到文学的神韵。近年来中国书法大热,散文红火,喜爱者、跻身者纷纷踊踊,兼而有之的追随者亦成千上万,但难得有几人入其法门。朱以撒既是学院里教授书法艺术的教授,又是拥有几本书法理论著作的理论家,还是文学界瞩目的散文高手,写得一手好散文,其文字高雅古朴,意蕴悠长;更加难得可贵的是,他一直避开中心的喧嚣,躲在边缘安静地读书和写作,两耳不闻窗外事地钻研学问,呈现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本色面目。正是这几方面因素的叠加,才能写出《腕下消息》这样的文章。

最令我拍案叫绝的是俄罗斯年轻姑娘伊莲娜·库图佐娃的《中国随笔》系列,自从在《江南》杂志第一期开始露面,就迅速聚拢了文坛和读者的眼球,喝彩不断,转载不断,被入津津乐道,后续诸篇也莫不如此。这个24岁的纯种俄罗斯美女简直是个谜,来中国留学前,她还有一个斗大的汉字也不识,可是仿佛有神灵相助,仅仅用了4年苦功夫,就把典雅的古汉语和当今活的中国话,掌握得就像土生土长的自家话,还能活用得风生水起、进退如入无人之境,不仅比普通中国

老百姓表达得还顺溜,而且比一些中国作家还文采照人,直逼得我们这些以文字为生的中国文人“无颜见江东父老”。请看我随便引用一段:“山不在高,有石头就行;水不在深,有鱼就行。我在中国的留学生涯,就这么波澜不惊地玩完了,我真真切切地该卷铺盖回家了。如果诸位问我学校学了多少东西?嘿嘿,谦虚点儿说吧,学得还不错——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这几年把我累得上气勉强接着下气,临了,也没得出个子丑寅卯的重大成果,真乃双手空空,两袖清风。”就在这么短短一百多字里,古文、民谚、成语、口语、俗语、俚语,汉字的基本元素差不多都有了,还显现出一种佐琴科式的诙谐和幽默,真不知她是怎么“整”出来的?我只能暗暗惊心:难道汉字还有神秘规律没被中国作家们掌握,而只被伊莲娜·库图佐娃这个仙女窥破了?在此,我想多说一句:散文的探索和创新是没有边界的,永远去探索,永远无穷尽。

四

2011年我还参与了几次散文征文的评奖工作,有几点发现,也想拿到这里来说一说:

一是散文的生命力依然旺盛。散文在文坛的地位虽然远远不如小说,可是它所具有的人气却仍是所有文体里的翘楚,喜欢散文、忠于散文、参与散文写作的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比如《光明日报》经济部与中国邮政总局联合举办的“万家邮政故事”全国征文大赛,短短1个月竟收到1100多篇稿子,除知名作家陈忠实用到特等奖之外,有150篇作品获奖。中国散文学会与江苏淮安市联合举办的“漂母杯歌颂母亲”征文大赛已经连年举办了三届,投稿不减反而增多。就连山东德州作协与《德州晚报》联合举办的“全国红色散文大赛”这么一个地区性征文,竟然也收到来自天南地北的稿件1500余篇,而且基本上全部是群众来稿。

二是散文的整体水平有所提升。这些征文里面,还有平时我在工作岗位上收到的大量散文投稿中,实在有不少好稿子,其写作立意、构思布局、语言运用、境界向等,都很见功力,有的一点不比名家写的差。所以,包括一些大报和名刊在内的征文,名家的获奖比例渐渐少于新秀和非名家,这是值得欣喜的现象,说明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在不断上升。

三是散文的突破与创新让人期待。当下散文的写作虽然人多势众,可是全年盘点下来,能在文学史上留下大作品几乎没有,能在人们心理上刻下印痕的也没有几篇,就连独特一点的作品也很少。是社会化生活千篇一律吗,怎么大家都写得差不多呢?在我看来,不是我们的生活单调乏味,问题还是出在想象力上,我们民族的创造力上哪儿去了呢?当每个孩子都必须按照一个标准答案来思维,当每个公民都只会重复一两句流行的术语,当每个下属都只是对着上司唯唯诺诺,创新能力当然就看不上我们而远走他乡了!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好有冲击力:“在美国人看来,人类高贵的标志是拥有巨大的智慧。对于一个优秀的民族而言,仅有勤劳勇敢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拥有创新的渴望与激情。”(汪嘉波:《探索火星,美国为啥满怀激情?》)

这就又回到了本文的开头:创造、创新,乃当务之急。“功夫在诗外”,这不止是一个散文问题,也不止是一个文学命题,医治得从病根治起。

■看小说

杨惠玲《摆脚》

疼爱一个人其实并不难

有时候,已婚男女的交往不单单会令外界警惕,也会令男女当事人紧张,如何超越这种紧张和尴尬的状态,是两性交往必须面对的问题。杨惠玲的《摆脚》(《芳草》2012年第1期)提供了一个形象的答案。作品叙述了一个勤劳、朴实的中年女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郭玉芬的男人成天酗酒、抽烟、赌博、打老婆,是一个不但不顾家,而且也不疼爱女人的男人。郭玉芬在打短工的过程中认识了王大贵,王大贵的老婆是一个傻子。在一次偶然的欢愉之后,郭玉芬发现王大贵开始躲避自己。郭玉芬认为王大贵既然可以帮傻女人当孩子一样服侍,也理应能关心、同情她。但第二天王大贵找来一个大妈劝说郭玉芬离开,并引来围观。尴尬之下,郭玉芬逃出了王大贵的家。三天后,王大贵在一个破庙找到冻得发抖的郭玉芬,并把她领回家,郭玉芬与傻女人睡一头,王大贵睡另一头,郭玉芬把王大贵的脚放在自己的腋窝里帮他暖脚,王大贵也把郭玉芬的脚慢慢放到自己的腋窝里,一阵暖流从脚底流入郭玉芬心里。《摆脚》在较短的篇幅里融入了丰富的内涵。在男女的交往之中,双方可能都会在内心默默猜测对方在打什么算盘,都会权衡如何保护自己。这既是一种本能,也是社会交往中缺乏真诚和信任的一种表现。王大贵喜欢郭玉芬,但他有负担,他有老婆,怕人说闲话。因此,虽然他可以照顾、服侍一个傻女人,但却不能温暖郭玉芬。这不仅是他的负担,也是中国文化的负担,是传统习俗和观念的负担。

彭东明《大叔、二叔和三叔》

命运和财富都需要心理支撑

彭东明曾经是一位活跃的作家,在悄无声息十多年后,近来又开始小说创作。新作《大叔、二叔和三叔》(《小说界》2011年第12期)讲述了父亲的三个弟弟的命运转折,意味深长。二叔是一位手艺精湛的篾匠,走遍天下都有饭吃。大叔有三寸不烂之舌,计划经济时代贩卖耕牛,市场经济时代贩卖楠竹、副食。父亲尽管看不起大叔的游手好闲,但还比较放心。三叔当过兵,回乡后当民兵营长,是抓阶级斗争的好手,组织劳力修水库、修公路,但对种田是外行。随着时代的变化,三叔批斗过的地主、富农都富裕起来了,大规模动员、组织农民的活动没有了,三叔在农村没有饭吃了,但他坚决不种田,而是去推销石膏板,经过奋斗后在北京买房买车开厂了。此时,父亲最喜欢的大叔却没有饭吃了,因为乡村基本上已不需要篾匠。小说在叙述几个长辈命运戏剧性变化的同时,刻画出中国农民典型的性格特征,即对命运的紧张感和对富裕的不安。“父亲”觉得种田是最为稳当的生活,大叔的机巧、三叔的闯荡,都是不可靠的。在三叔成功后,“父亲”睡在他的别墅里,彻夜难眠,对他的财富充满了恐惧。这一性格背后是中国文化深厚的小农思维,吃饱饭、睡安稳觉是最踏实的生活。对农民来说,财富也是需要强大心理支撑的。具有耐心的和,父亲最放心的篾匠兄弟在失败后,也不得不转为种植柑橘和红薯,经历着市场的变化和冲击,并在其中体验和学习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种植。对农民来说,承受这一变化也是需要心理支撑的。(李鲁平)

《红军留下的女人们》是卜谷以自己真切的责任感历史观,为中国革命的女性碑立传所做的一次成功努力。

我小学有个同学,他爸爸是个老红军。那是个非常朴实又有些木讷的人,每去他家玩,他通常只是张罗我们吃饭喝水,不会说什么大话。这带给我异样的感觉。因为概念中的红军形象应该是功勋卓著,威风凛凛、位高权重,前呼后拥的;历来教育中的革命者,都是目光锐利、立场坚定、勇往直前的,但这个老红军给我留下了一种与被语言所塑造的革命红军概念有点差距的印象——我就从这里说开去,卜谷的《红军留下的女人们》再次唤起了我童年接触那个老红军时的感觉。

红军这一代跟抗日这一代,差别很明显。因为抗日是全民族的抗日,各界精英奔向延安或者奔向重庆,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准相对说是比较高的。但是红军这一代,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主体都是我们土生土长不识字的农民。正是这样一批人养育和支持了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为中国的现代历史转型奠定了一个基础。革命从这里出发,是中国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命运或者宿命。卜谷通过《红军留下的女人们》这部书的写作,挖掘呈现了或者说再现了我们所熟悉的革命历史之外的另一种革命历史。当我们从农民和女人的视角去看历史,去理解那个时代的革命,就会看到,原来在那些波澜壮阔、伟大光辉的革命之外还有这样一种革命。卜谷这部作品,从一个鲜为人们关注的视角,给我们补上了一个更为原生态的、更关乎我们生命

■短评

革命、牺牲与文学的本色

——从卜谷的《红军留下的女人们》说起 □陈福民

感受、更容易为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理解的历史。所以在“历史之外”写历史,是卜谷这部书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启示。

第二个启示,就是在“革命之外”。每当说到革命,很自然就会想到政党、战争、国家、未来等等,这些都是革命题中应有之义。但同时,革命是要死人的,革命是要吃饭的。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所说的,马克思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于“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此,使每个人以及这些人构成的一个族群或者国家能够拥有吃饭的权利,是革命最伟大的定义。《红军留下的女人们》在历史上所呈现的革命,正是由那些具体到了“吃、喝、住、穿”的生活元素所构成的。比如革命胜利后黄明生军长寻找他失散多年的瞎妹妹,按照通俗的想法,哥哥当了将军,要从贫苦破落的地方接妹妹到北京那么神圣高贵的大地方去享受荣华富贵了。兄妹团聚的背后是成功者对牺牲者予以弥补的革命逻辑,而放弃团聚,似乎是一种生活逻辑。仔细

想,哪个逻辑更强大更真实呢?这是需要作出选择的。最终,这个女人选择留在瞎丈夫身边。这个老瞎子不仅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老师,是她落难时的救命恩人。如果我们从这些细节去进入革命的话,就知道革命其实不仅仅仅是面对屠刀的牺牲,它还有许多艰难的、难以取舍的东西,需要靠人的本性去判断。卜谷就是在这个角度上给我们呈现了革命的另一方面,如果革命离开了这些很真实的元素,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因此在我们流行的革命描述之外,《红军留下的女人们》通过很多视角,呈现了革命之外的革命。

第三个启示,就是在“江姐之外”。这部书的主题是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主角是女人。战争让女人走开,但中国革命请女人参加了。以往我们所了解的中国现代革命中的女性,基本是江姐、赵一曼、刘胡兰这一类慷慨赴死、英勇就义的形象,这固然是非常真实的一面,但是卜谷通过《红军留下的女人们》的这一面,给我们展示的是在江姐之外,还有如此平淡悲惨的牺牲——我们说的这个英勇牺牲,不是喊着口号的英勇牺牲,而是跟生活逻辑相关的、令人震撼无言的一系列的牺牲。这幅

千载大足的亮光

□王明凯

的宝顶响起,把“不现比丘身”的赵智凤清苦70年倾动朝野的壮举,雕刻成传世万代的护法神像、六道轮回图、广大宝楼阁、千手观音、佛传故事、释迦涅槃圣迹图、九龙浴太子、孔雀明王经变相、毗卢洞……辉煌的传说从南宋走来,越过太傅湾、小佛湾、黄桷坡、松林坡、大广山、龙头山,让我们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与佛见面,与魂见面,与5岁落发为僧、16岁云游天下、20岁普施法水、70年终成大器的一代大师赵智凤见面,与集佛、道、儒于一体的“石刻晚钟”见面